

# 江南

观点

## “水之德”： 江南文化的大义

■ 胡晓明

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风花雪月、水暖风清之地，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，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

“江南”，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地名，一个灵秀的地名，一个高感性的地名。江南离不开水乡，水乡与水乡之人因柔性而仁爱，因清淑而清明，因平澹而内敛，因凝聚而廉贞……

如果提炼出江南性、江南的大义，就是“水之德”。《老子》中直接提及“水之德”的有两处：

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

“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”

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。”

江南的水，至少有七个特点：一、柔与刚。所谓滴水可以穿石。很多形态各异的地貌即是千万年来流水冲刷而成。

二、生与杀。水一方面能够生万物，滋润、长养万物，历来人们都喜欢依水、傍水而居。但水其实有很多灾害，瞬间可以变成鱼鳖、变为泽国，所以生杀原是一体二面。江南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这上面。譬如顾炎武说江南的一个缺点是侈靡，销金窟，这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命。

三、清与浊。水清可使浊，浊者又可以重新变为清。正如江南的才子型士人，是不确定的，有时候是浊，是坏，有时候又是清，清浊互用，正邪相生。《红楼梦》里所说的乖邪之气，杨龙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，跟马士英阮大铖在一起时是浊的，但最后成为抗清英烈，大时代的巨流下，他坚守住了清正。吴梅村也是如此。他说他的墓碑上只需写“诗人吴梅村之墓”即可，这都是由浊返清，回到了清的本分。江南人是变化的复杂的。江南人懂得不能简单绝对化看待世间的人事。

四、容与不容。海纳百川与涸蹄岳峙。容就是藏、纳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容乃大。不容又是猫介之士的有所不

为。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到包容、宽容与接纳，也可做到有所不为的不容。前者是对他人的态度，后者是对自己的标准。该学习、进取、包容的时候，海纳百川；该守住自己的时候，涸蹄岳峙。

五、执与不执。“泻水置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”，水随物赋形，变动不居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无成执，无常形，此为其不执。同时，百川到海，万折必东，不舍昼夜，精进不止，此为其执。

六、隔与不隔。这正是江南的美学。水既可以造成“八表成江，平路伊阻”的隔绝，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又可以因为阻隔而产生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这就是不隔。在中国文学中，“词”就特别具有水的这种隔和不隔的美。园林、书法、建筑、昆曲、评弹、古琴、水墨，都具有此一特美。这是中国文化、中国艺术的特美。

七、有与无。水性若水，水体常有，有无或然，有无相生。有即确定性，现成性，无即非确定性，非现成性。得失、盈虚、成毁都是相流转变化的。江南的精神是一直前瞻、开拓、创造的。

举一例，“七里山塘春水软，一声柔橹一销魂。”苏州山塘，中国江南最柔软的地方，充满了最委婉气质的美。但是山塘旁边就有一个“五人墓碑”。“山塘满路皆脂粉，可少秋风侠骨香”。因此，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风花雪月、水暖风清之地，江南是中国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地方，也是中国最具有骨气的地方之一。当然，这是刚健精神的一个含义。刚健精神在今天，更重要的含义是它的创造性、开拓精神。这是从江南风骨、江南的血性当中转化而来的。

最后，用一首诗，回到江南另外一个特点：上善若水。

《船子和尚拔棹歌》云：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我的一位老师曾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来解释这首诗：“千尺丝纶直下垂”，人的欲望，人的潜意识，非常深；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，不知道何时你的欲望就会发生一种联系，怎么办？“夜静水寒鱼不食”，就是要放弃，放手，放开，退到边缘，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，即：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、教授）



陈逸飞笔下的江南

##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

■ 熊月之

何处是江南？江南为何物？江南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为何要在这个时代讲江南？

近日，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，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承办的“解码江南以启未来”2019年望道讲读会首讲在嘉定秀舞台开讲，旨在唤醒听众对“江南”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意识。

本报在此独家选刊胡晓明、熊月之、唐力行三位江南文化研究专家的主旨演讲。

——编者

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，最好的表彰语便是“小苏州”。近代以来，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无锡等地都是“上海化”严重的地方。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“小上海”

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？从地域来讲，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；从空间性质来讲，是城市与乡村、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；从相互关系上说，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。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，我认为有五个方面。

【继承】

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，统属于江南文化。在文化地位上，苏州、杭州、南京等地高于上海。以上海与苏州而言，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。苏州物产丰富，多富商大户，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，多文化名人。

近代以前的上海县，扩大而至松江府，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，仰视苏州。苏州书画出名，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。苏州戏剧出色，上海人便崇尚苏州戏。苏州家具、服饰、饮食，各类行为方式，都是上海人欣赏的对象。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，最好的表彰语便是“小苏州”。民国时期学者研究上海话语系，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%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。

【集聚】

1860年代以后，上海经济、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。1900年，上海人口超过100万，已是中国最大城市。1947年，上海人口430万，南京103万，杭州61万，苏州39万，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。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。1930年，江苏、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.4%，占华界人口的85.5%。1950年1月，江苏、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，占上海总人口的88.9%。近代上海人口中，江南人占了80%以上。

近代外资企业，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。华资企业，也主要集中在上海。到1923年累计，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，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共106家。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，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。太平天国战争以后，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，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。

【扩散】

密布的水网，黄浦江、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，沪宁、沪杭两条铁路，众多的公路，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上海的人才、技术、资金，以及文化、风习，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，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，一起创办企业。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，也在无锡设厂，两地技术相通，人才互动。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，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。

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，几如浓雾罩地，无处不在。从照相机、留声机、自行车、电灯、电话，到西装、西餐、电影、跳舞，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，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。时论认为，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无锡等地都是“上海化”严重的地方。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“小上海”。

【融合】

上海仿佛是一只熔化人的洪炉，一切风俗习惯，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，最会熔化人的。但融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，到了上海不需一年，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熔化，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，言与行两大条件，都会变成了上海式。至于衣一履之微，那更不用说了。说也奇怪，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，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，也容易上海化，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，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。（沧海客：《上海观察谈》，《新上海》，1925年第1期）

1934年，有很多知识界名人讨论“上海明天”。曾觉之预言，异质文化经过会面、交流、交融，将会产生新的文化。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、交流、交融、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，成为催生新文明的“洪炉”。

【创新】

人口规模越大，人们互动、交流机会便越多，创造与创新也越多。产业、人口、资金高度集聚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，必然刺激分工细密、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。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，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。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，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，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，创新速率越大。

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，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，在全国所有城市当中，外国人、居住外侨比例最高的。这两个特点，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集聚、创新的最突出之点，就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。

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、持久而密切的联系。这使得上海的市场，犹如全国各地共同开办的超市，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，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，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。

近代上海“一市三治”，日常生活中，租界市政建设先进，整洁卫生；华界落后肮脏，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辱感文化。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。租界华人长期只有纳税义务，没有参政权利。诸如此类，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。

“一·二八”与“八·一三”日军两次侵略上海，直接轰炸、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，而租界则基本完好。这种被辱、挨打、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，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，是任何远处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。

总之，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，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，以江南人口为主体，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，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、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、研究员）

## 苏州评弹，江南地域的文化符号

■ 唐力行

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话，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图景

苏州评弹不仅是观察江南社会的窗口，她与江南社会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。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二个曲种组成，其渊源可追溯到

唐、宋，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，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。

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，占全国22.8%。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。于是有状元、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。

昆曲曲高和寡，主要流行于士大夫的圈子里。而评弹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，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。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，昆曲又称之为“水磨腔”，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。如果说评话有太湖般开阔澎湃，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

水。水是最柔和的，也是最坚韧的。似水长流的评弹，深藏着苏州人的市民心态，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，叙述着苏州人的机敏、睿智、沉稳和变通。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生活方式，“所谓说书者，实起于苏州。苏州人闲者居多，饭后听一回书，挤在茶馆中度生活者，比比皆是”。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办公室。苏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话，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图景。

江南水乡水网密布，评弹艺人行装简单，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，弹词艺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。评弹演出场地也极简单，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（或二椅）即可开讲。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中心城市。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，人口流动小，演毕就要换场地，且数年内不会重复复演。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。不过说书的走码头，仅是南抵嘉兴，北达武进，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，这里也就是吴语区。

乾隆年间评弹趋成熟，乾隆37年的弹词抄本《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》、乾隆刊本《新编重调三笑姻缘》等，一直流传至今；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，如演说评话《隋唐》的季武功、弹词《落金扇》的王周士、弹词《白蛇传》《玉蜻蜓》的陈遇乾、俞秀山等；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，如王周士的《书品·书志》。

我们现在能够统计到的苏州评

弹的长篇书目，评话是70部，弹词86部。一个人从懂事开始听评弹，听到老也不会重复。所以说，长篇书目和书场是评弹的生存方式。

太平天国运动以后，江南中心移到上海。评弹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。“上海的书店业有一个疯狂时期，三四马路、大南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，简直是五步一家，十步一处，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和招牌”，其时，评弹也出现新气象：一、男女评弹艺人可以同台献艺。二、评弹演出过程中，穿插广告，成为当时私人电台的经济来源。三、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。《申报》1926年3月29日介绍吴宓《希腊文学史》一文，指出：“据上所言，荷马的史诗，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，是民众文学的结晶。不过我们中国的所谓弹词士大夫素来看不起平民的作品，以为不能登大雅之堂，所以从不肯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。”“拿《伊里亚特》《奥德赛》与中国弹词大鼓一类的东西并论，就是希望中国现在的文艺界，发生进一步的了解”。一些知识精英撰文充分肯定评弹的社会功能，“将来风俗之善良，社会之进步，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，予不禁拭目以俟之”。

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，借助上海城市的辐射力和强大的电台、报纸及新媒体力量，其流布区域进一步扩大，也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整合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）



吴冠中笔下的江南